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 编

丁守和 主编

上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上
卷

启 蒙
运动的
发端

(1840 ~ 1914)

本卷选编 郑大华 任 菁

丁守和 主编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中、下)/丁守和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11

ISBN 7-80149-157-2

I. 中… II. 丁… III. 近代哲学-哲学思想-中国-文集 IV. B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7503 号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中、下)



主 编: 丁守和

责任编辑: 黄燕生 杨 群 范广伟

责任校对: 同 文

责任印制: 盖永东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隆华印刷厂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54.75

字 数: 1372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ISBN 7-80149-157-2/B·027

定价(上、中、下): 10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永 遠 要 提 倡

民 主 科 學

胡 漢

一 九 二 九 年

四 月

五の運動八十周年

德賽兩先生不朽

劉士年 五十九年四月

编委会主任 李慎之

主 编 丁守和

编委会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守和 马 勇 左玉河

华贻芳 李慎之 宋牧遥

何秉孟 杨天石 郑大华

耿云志 谢寿光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编辑体例

一、本书涵盖的内容上起 1840 年鸦片战争，下迄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按时间顺序共分三卷：第一卷，1840~1915 年；第二卷，1916~1923 年；第三卷，1924~1949 年。

二、每卷之始，有该卷编者撰写的前言。

三、每卷之中，按内容分为若干专题，每个专题前有介绍本专题的说明文字。

四、每专题之中所收文章，原则上按发表或写作时间为序。

五、由于本书所收文章较多，而篇幅有限，为方便读者，一些常见资料之出处列于每专题目录之后，正文中不再收入。

六、本书所收各文，尽量使用最初发现的底本或手稿：如无法找到底本或手稿者，则注“选自”某处。各文出处及发表或写作时间将尽量注释详尽，以便利用。

七、本书所收文字，除个别篇幅过长予以适当删节外，原则上不作任何更动，原文脱漏或手民误植者，由编者径改，不另出注。如有衍文，则以（ ）删除；如明显漏字，则由编者以〔 〕号补足。

八、文章之原有注释，凡不影响理解原文文意者，予以删除，否则予以保留。

九、本书各文一律改用通行的标准简体字，个别文字更改如影响理解文意者，则予以保留。

十、本书各文一律改用新式标点。原文个别处有着重号者，一律删除。

绪 论

丁守和

今年是五四运动 80 周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五四运动的意义越来越加明显。

五四是爱国民主运动，又是启蒙开新的文化运动。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呐喊，启发国民觉醒，发生广泛影响，促进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然而这个运动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既有前因，也有后果，这就涉及到中国近代启蒙思潮。

多年来，学者们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也涉及启蒙思潮问题，或研究过某一阶段。而对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全面系统研究还很不够。而且由于资料分散，有些资料越来越难看到。因此，我们编选了这部《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以便研究者参考。本书主要是围绕宣传民主科学，反对封建专制迷信愚昧，呼唤国民觉醒等选材的。因篇幅所限，有一些较容易找到的，在书中只引了篇名和出处。又由于时间所限，书中所选可能还有遗漏或不当之处，尚请读者指正。

启蒙与民主科学

启蒙思想是从外国学来的。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有“蒙学”，如《幼学琼林》、《增广贤文》及《三字经》、《千字文》等，那主要是幼童入学时认识字的课本，其中有某些历史知识及当时的人伦道理规范，也有“光宗耀祖”、“改换门庭”等观念。近代启蒙

思想则是高扬民主和科学精神，反对封建专制及其伦理道德、愚昧迷信思想，鼓励人们从封建愚昧落后观念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近代化现代化，创建民主自由的新社会新文明。启蒙思潮是与民主和科学紧密相联的。

民主和科学是近代文明的精髓，也是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和精神支柱。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进步，民主和科学显得越来越加重要。马克思恩格斯就很重视民主自由，认为未来的社会是以“人人自由”为前提的。

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又不限于政治制度。马克思说，封建专制是“使人不成其为人”。民主则首先是尊重人，是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是人的精神解放、思想自由、人格独立、人权平等，是发挥人的主体意识、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精神，表现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

科学当然要重视自然科学研究，但又不限于自然科学研究、新技术技艺的试验或创建、新的创造发明，而且要反对主观武断、愚昧无知、迷信盲从，坚持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和理性主义，勇于追求真理。观察宇宙或社会的任何事物，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必须尊重科学，始终保持科学精神和求实态度。

民主是专制主义的对立物，科学是蒙昧主义的对立物。民主和科学是欧洲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时代，先进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们在同封建专制和宗教神权的斗争中产生的。他们提供的精神武器，为摧毁野蛮残暴的专制统治奠定了思想基础。民主和科学的发展，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独立思考和对真理的追求，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马克思恩格斯曾高度赞扬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

民主和科学又是产业革命和社会化商品大生产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伟大成果和结晶。近代社会的发展是同

民主和科学紧密相联系的，并构成近代文明的中心。科学没有国界，民主精神也不受国界的限制。虽然民主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要求和特点，有不同的认识和实践，在制度上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但总需要尊重人，总要有人格独立、人权平等、政治信仰思想言论等自由，发挥人们的主体意识、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民主和科学精神，已经成为人类的共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民本”思想，而无民主思想。在古籍中的“民主”二字，其实那是“寻民主”、“作民主”，绝不是“民作主”，或民为主人。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较发达，如《尚书》中说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等。民为何这样重要？《诗经》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是说有民的地方才有邦国，没有民哪来的邦国和君主？所以民非常重要。但民并不是主体，而是载体。孔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离不开身体，而身体行为要受心的指使。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尚书》有“予临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马。”都是把民看作载体或工具，但又不好驾馭，弄不好就会翻船翻车的。如魏征所说“怨不在大，其畏惟人。载舟覆舟，其宜深慎；奔马朽索，其可忽乎？”因而统治者必须谨慎小心，要保民重民、爱民利民恤民，“省刑罚，薄税敛”，给民些“恩赐惠施”；民则感恩戴德，叩谢“吾皇万岁！”“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虽劳无怨，虽死无怨”，当顺民。在那小生产自然经济时代，民本思想虽然也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与近代民主思想是不同的两码事。马克思说过，农民分散脆弱的经济地位，使“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如天文、历法、地质、地理、农学、医药、物理、化学、光学、冶炼、陶器、造船、建筑等，都比较发达。但缺乏科学理论基础，重经验相传，轻理论总结，被称为工艺、技术、器物等，属于“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范围，也没有“科学”这个词。中国天文历法发明很早，但有明显的神秘色彩。如将天空的群星列宿与人间的君臣相联系，认为君主只要实行德政，臣民们就会像群星拱卫北斗那样，万世长存。最近在南京发现的朱元璋墓中就有北斗星，表示他是天星下凡。据说，指南针、火药、造纸术等中国发明最早，是由中国传入西方的。然而在中国并未引起生产力和社会结构的什么变化。火药在欧洲对轰塌顽固的封建堡垒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在中国却用来制造鞭炮烟火驱邪，或在国内自相残杀；指南针对世界新航路的开发有关键性的意义，我们则用来看风水、卜吉凶，当然修建北京城也使用了指南针。西人用这些发明制造出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古老的中华大国被卷入世界的大潮之中。

近代以来，随着侵略者的炮舰涌入中国的西方文化，是较农耕文明更为高级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它不仅威胁到中国的专制统治，而且使整个民族面临危亡的关头。所以，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带有屈辱被动和非自觉性。一是从“天朝上国”的尊崇地位沦于被动挨打的卑屈境地；二是从优越发达的对外文化传播，转入被迫接受先进文化的冲击；三是从积极主动的文化交流，转入消极被动的文化选择。这就使中国人在步入近代历史之际，蒙上了浓厚的民族感情和正义理性的道德因素，救亡图存成为中国人直接自觉的需要，而顺应时代潮流发展则不是那么自觉和明晰。从而加剧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艰难和曲折，民主和科学思想理解的重点也有所不同。

民主科学和启蒙思想从19世纪中叶开始传入中国，是与中国近代化的历程相伴而行的。由于中国是个老大的封建帝国，专制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传统深远，近代以来又受外国列强的侵略

压迫，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都已经落后，社会状况甚为复杂，启蒙思潮几起几落，民主和科学也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历程，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理解、认识和运作，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并引起中国社会的变化，但启蒙运动的工作始终未能完成。

中国近代思想潮流很多，很复杂，而且多变，变的多变得快，但就其主流来看，都是围绕着爱国、救国和治国而展开的。中国外受列强侵略，内受专制统治，民族危机、社会危机和人民生活痛苦甚是严重，国家处于危亡之中。中国先进分子总是抱着爱国救国的强烈愿望和热情，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探求治国的方策，以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开始是“开眼看世界”、“师夷制夷”、“制械练兵”，接着是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及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以为外御强敌，内行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使中国向近代化发展。以后又学习社会主义，学习社会主义也是为了救国。所以虽然也有反封建反专制的启蒙宣传，但很快又转入政治斗争。救亡超越了启蒙。

在欧洲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和发展，从14世纪出现文艺复兴运动，提倡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宣传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个性解放。接着有自由平等思想的传播及其与封建专制主义的对立，科学的发展科学思想的流传及其对宗教神权和迷信盲从的冲击，启蒙运动兴起；经过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说和民主思想激荡，而后才有民主革命和社会制度的改革，民主制度的建立，并在人权宣言和宪法中将人民的各项自由权利利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任何人都不得侵犯。在中国则先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借法富强”，“船炮工商”、“制械练兵”，接着是提倡“变法维新”、君主立宪；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民主共和。当时的先驱者也宣传民权民主、进化论、天赋人权说，宣扬自由平等博爱、民有民治民享等思想，但重点是力图通过变法或革命改变政治制度，以为只要能实行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其他都比较容易解决，全国人民就会万众一心，国家就会独立富强，外强也

会尊重中国。尽管这种认识有局限性或片面性，但他们确实是这样认识的，并为此而进行了艰苦奋斗，乃至流血牺牲。这自有中国的国情。

由于强调政治制度变革，中国近代思想家宣传民主民权也主要是从救亡图存出发的。因而他们肯定民主价值的标尺不是人权，而是用来作为救国的手段和治国方策。他们的宣传不是强调人格独立、人权平等、个性解放，而是强调国家独立解放和富强。他们也宣传人的权利，但又宣传或着重宣传对个人的自由权利作这样那样的限制。他们从救国的意愿出发，认为当时中国最需要的不是争个人自由，而是争国家的独立自由。这是中国外受列强侵略压迫和历史传统造成的，有其合理性。但也反映当时人们对民主自由的认识不足，容易使他们对近代民主思想与古代民本思想混淆不清，从而妨碍了他们对封建主义的认识和批判。就这方面说，无论是维新派或革命派，都未能与封建主义彻底决裂，而表现了不同程度的妥协性。这自然与中国经济落后，资本主义很不发展有关系。

五四时代开始改变这种状况，前进了一大步。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也是从爱国救国出发的。他们满怀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深深感到“今日之中国，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要挽救国家危亡，使中国向现代化发展，就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和科学，扫除人们头脑中的腐旧思想和愚昧观念，唤起国民的觉醒。他们鼓吹人权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蒙昧，反对传统的尊卑贵贱和以纲常礼教为核心的旧伦理旧政治，要独立自主的人格、平等自由的人权，个性解放、思想自由，这是时代所需要的。没有个性的解放，没有独立自主人格和思想自由，就不可能有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独立自主的国家不是奴隶们所能造成的。启蒙运动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在民主和科学的影响下，培育了整整一代新人。在以后几十年现代史上政治和思想界的风云人物，或教育科学文化学术界的有造诣的专家学者文艺工

作者等，大多是五四时代所涌现的，或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启发和影响。

20年代以来，由于列强特别是日本侵略的加紧，军阀混战不已，新文化启蒙运动很快转入政治斗争和救亡运动。这时出现的一支新的政治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俄国革命为榜样，以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标，而现阶段则是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建设民主共和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在辛亥革命后经历了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几次嬗变，又恢复了三民主义，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有了新的转机。在这以后国共两党时分时合，曾两次合作，两次分裂，进行过激裂战争，并有抗日战争。救亡超越了启蒙，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虽然当时也有些知识分子继续宣传民主科学、人格独立、人权平等，那主要是在一些大的城市，在激烈的战争年代影响不大，反封建愚昧蒙昧思想的任务远未完成。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五四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认为那时一般新人物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宣传民主和科学，立下了伟大的功绩。他同时指出，这个工作在五四运动时不过是刚刚开始，要使全国人民完全摆脱封建主义的统治，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一直到80年代，邓小平还提出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问题。

初期启蒙与民主科学

上卷

中国在十五六世纪已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官府苛捐、官商排挤、高利贷盘剥和传统轻商观念，始终未能成长起来。封建专制统治越来越加严厉严密，文化专制的文字狱接连不断，科举考试只能在经书中寻章摘句，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中国人是在西方侵略者用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被迫向西方学习和接受

新事物的。他们首先看到的是侵略者的坚船利炮，然后才接触新的政治制度和学说，从事变法维新和革命。这也正是启蒙思潮的开端，是逐步深入的。

还在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就“开眼看世界”，组织翻译西人书报，编为“四国志”，介绍西方国家状况。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认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他还驳斥某些人称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之谬说，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他认为通过学习，中国一定能赶上西方国家，“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姚莹则指出，若坐井观天，视四裔若魑魅，愚昧无知，坐等侵陵，而无所忧虑，那是不行的。徐继畲、梁廷枏等也都介绍了西方国家的一些情况和民主制度，流露了对中国专制的不满和对民主政治的向往。

洪仁玕曾向洪秀全提出《资政新篇》，认为应效法西方，发展近代工业、交通、邮政、金融事业，并介绍美国的民主选举，建议“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礼仪伦常及各种活动，“均应立法以为准”。冯桂芬写的《校邠庐抗议》则要求清政府实行变革，提出“倡西学”、“制洋器”，学习西方的科技，发展工商交通事业。还将中西内政作比较，认为“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弃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君民“相隔”正是专制制度造成的，反映了他对专制的不满。他们的立场是对立的，而主张学习西方，改革中国旧政，却是相通的。这也反映了时代的要求。

从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中一部分官僚曾国藩、李鸿章等，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开始认识中国军事经济的落后，提出“借法富强”。他们并不想改变中国的专制，但为适应新的变局，也认为应该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洋“制械练兵之术”。李鸿章说：“今日当务之急，莫若借法富强。强以练兵为先，富以裕民为本。”于是搞起洋务活动，开办一批新型军工和民用企业，创办一些新式学堂，并成立编译馆，翻译外国科技及史地、

政法书籍，试图从船炮工商科技方面进行改革，通过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及商办等形式，为中国近代化起了开拓作用。洋务运动的意义是它开始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失败则是未改变腐败的专制制度。

与洋务派有关的知识分子则进而认识到，要使中国独立富强，不但要发展工商科技，还须实行变法，改革政治制度。郑观应、王韬等揭露了专制政治的种种弊害，指出君主专制有百害而无一利，不仅有害于民，亦且有害于君，“不利于民者，终亦不利于君”。中国所以欺藐于外强，是由于“一人秉权于上，而百姓不得参政于下也”。所以必须改变这种制度。郑观应主张“君民共主”，认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权得其平。”王韬提出“君民共治”，“上下相通”。实际上都是君主立宪。他们和郭嵩焘、薛福成等还提出设议院，但很少涉及自由。稍后何启、胡礼垣提出公平即公正、平等思想，并讲到“天赋人权”，“天下之权，唯民是主”。民主思想比较明显。郑观应、宋恕、宋育仁等还提出广办学校、多开报馆，认为学校是“造就人才之地”，报馆是广听远闻，通达民情、广开民智之“嘴矢”。这都是启蒙所需要的。

甲午战争失败，震动朝野上下，“变法维新”运动兴起。维新派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他们从洋务运动的失败认识到，不但应学外国的船炮练兵、科技工商，而且必须学外国的政治制度和理论学说。他们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学堂、书局，要求倡西学、兴民权、废科举、兴学堂、开议院，抨击专制，宣传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说；力图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面貌自上而下地改造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发展民族工商业。进化论为他们的变法提供了理论根据，民权说为他们批判封建专制提供了思想武器。

面对变法维新思潮，顽固派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变”。洋务派坚持“中体西用”，认为可以设学堂、译

西书、办报馆、开矿筑路、奖励工商，一些制度也可以因时而异，而“不可变者，伦理也，心术也，三纲四维也”，君主制是圣人的治国之道，是不能变的，如果改变，一定会祸乱国家。张之洞认为“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纲纪不兴，大乱必起。”他不承认自己愚昧，反而指责翻译搞错了。在他看来，外洋民权之说的由来，不过曰国有议院，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而已。但欲民伸其情，非欲民揽其权，“译者变其文曰民权，误矣。”自由也是说“事事公道，于事有益”，译为“公论”可也，“译为自由，非也”。这正表明其无知，也反映了当权者对民权、自由的畏惧。

维新派从多方面驳斥了顽固派、洋务派的谬说，指出“中国致弱之由，百弊丛生，皆自体制尊隔之故”，专制制度实为中国致弱的祸根。故欲中国富强，必须“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康有为多次上书，强调“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阐明“三权鼎立”，宣传民权和大同博爱。梁启超倡言民权，攻击“民贼”，宣传变君主制为议会民主制是变法的本源，由民权代君权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的贫弱虽千因万缘，皆可归狱于君主”。还提出“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之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谭嗣同激烈攻击君权，“冲决网罗”，批判纲常礼教，主张民权、平等。他认为中国长期君主专制统治，“启蒙成平等亡，公理晦，一切残酷蒙蔽之祸，斯萌芽而浩瀚矣。”强调“今之策中国者，必曰民权。”严复译述《天演论》，以生物进化观点激励国人，在“生存竞争”中争取“优胜”而避免“劣败”。他猛攻君主专制，斥君主为窃国“民贼”，其道德法令，什八九为“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民为“天下之真主”，统治者必溺而愚之”，而后“保其窃于永世”。故必须“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他着重宣传了自由思想，“民之自由，天之所界”，并把中西文化差异归结为“自由不自由异耳”。“夫自由一言，为中国历代圣贤之